

引用格式: 崔海智, 王芳. 苏联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认识和反应(1949—1964年).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5, 40(Z2): 154-162,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40628001.
Cui H Z, Wang F. The Soviet Union's understanding and reac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force (1949–1964).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5, 40(Z2): 154-162,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40628001. (in Chinese)

苏联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认识和反应（1949—1964年）

崔海智^{1*} 王芳²

1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系 上海 200241

2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 面对中国多次提出的援助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请求, 苏联都以中国经济和科技能力不足, 缺乏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条件, 以及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为由予以拒绝。20世纪50年代中期, 随着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战略决策的做出和中苏关系的发展, 苏联开始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向中国提供援助, 并在1957年将援助扩大到战略威慑力量的发展领域。但苏联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随着中苏矛盾的发展, 苏联领导人不仅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援助开始进行种种限制, 而且一再违背援助协议, 拒绝向中国提供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 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 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政策进行批评, 另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努力进行阻挠。在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首次取得成功后,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对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认识, 苏联对中国的战略武器试验做出了谨慎的反应。

关键词 中国, 苏联, 战略威慑力量, 研制, 反应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40628001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40628001

关于苏联与中国原子弹的研制, 国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囿于从中苏关系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 并对苏联在中国研制原子弹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上

存在分歧: 一些学者, 特别是苏联学者认为, 苏联的援助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产生了重大作用^{[1,2]①}; 而另一些学者在分析苏联对中国原子能技术的援助及苏联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自然科学史专门项目 (E4291J06ZY)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25年1月11日

① 这些学者认为, 苏联的援助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速度至少加快了10—15年。参见文献[1]和文献[2]。

专家的作用后，认为中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1964年或1965年研制出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3]。本文从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认识、对援助中国的考虑、中苏交恶后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批评和阻挠，以及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反应几个方面，深入考察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认识和作用。

1 苏联对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问题的认识（1949—1955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做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并在1950年初与苏联签署了为期30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和苏联在事实上确立同盟关系。但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依然面临非常严峻的安全环境。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随着冷战在亚洲爆发，中国先后卷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中，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

尽管毛泽东曾说原子弹是“纸老虎”^②，但这只是为了在战略上打击中国的敌人。对于原子弹的威力和中国面临的核威胁的严重后果，中国领导人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面对美国的核威胁，中国领导人认为，生产核武器是中国唯一有效的自卫手段，否则不可能保证国家的长期安全。早在1950年初，毛泽东在莫斯科进行访问期间，便产生了中国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想法^[4]。1953年，毛泽东指出，为了保证中国的安全利益，我们必须掌握划时代的军备和与之相应的最先进的战术^[5]。为了应对美国的核威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6]。

在中苏同盟的背景下，对于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中国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得到苏联的援助^[7]。1952年6

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在编制《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军事计划纲要》时，曾考虑要研制原子弹。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向苏联方面试探，请求提供援助。但苏方认为，中国不具备搞尖端技术的条件，应先搞常规武器，除同意帮助中国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外，对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问题根本不谈^[8]。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对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帮助制造原子弹的请求，从不信任毛泽东的斯大林，明确地拒绝了这一要求^[9]。因此，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未向中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核援助。

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联最初对中国发展原子能和核武器也是不赞同的。1954年10月，在对华进行访问期间，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发展原子能、核武器的援助请求，赫鲁晓夫劝说道，中国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10,11]。

为了维护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55年初，苏联决定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对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1955年1月18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苏联向中国及东欧一些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原子锅炉和基本粒子加速器，并为进一步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培训科学和工程人员。后经多次磋商，苏联最终决定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并为此在1955—1956年期间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议。

这些协议的签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掌握原子能以及发展自己核武器的信心。于是，中国又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援助请求。1956年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带领一个代表团访苏，寻求关于武器技术的援助。苏联领导人仍只答应“支援科学和技术人员，允许50名中国大学生到苏联学习这些专业”。这个决定

② 斯特朗：毛泽东访问记，参考消息，1946-09-29。

使中国决策者认为“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不打算帮助中国发展先进武器”，苏联政治局对援助中国的核项目有很多担心，甚至连工业应用的核项目也不愿意支持^[12]。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中国发展原子武器的消极立场与其外交政策和核政策有很大的关系。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总路线的同时，提出苏联对核时代战争与革命之间关系的新看法，“认为核武器对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同样构成威胁……所有国家（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发展它们自己的国际关系，以防止一场世界核战，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看到的，将不是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道毁灭”^[13]。因此，为防止核战争，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英进行禁止核武器谈判。

正如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所认为的，赫鲁晓夫所支持的禁止核试验和裁军问题，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意愿相违背^③。正是对核武器这样的看法和认识，以及与西方国家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需要，1954年10月，赫鲁晓夫拒绝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请求。1956年2月8日赫鲁晓夫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与中国分享苏联原子能工业的经验，增加苏联高校中中国物理和化学专业学生的数量，并派遣核能生产专业的教师到中国高校工作，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甚至愿意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不鼓励中国发展核武器^[14]。

因此，1957年10月之前，苏联对中国原子能的援助仅限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国核工业的援助都非常小心地避开军事用途^[4]。

2 苏联对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战略考虑及其结果（1957—1960年）

1957年夏，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立场发生了

变化。为了获取毛泽东的支持，苏共中央再三邀请毛泽东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5]。中共中央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向苏共中央提出了组织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在原子弹、导弹、航空等方面给我国以技术援助的要求^[16,17]。对于这一请求，苏联领导人最终做出全面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决定^[18]。随后，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并经批准率代表团于1957年9月7日赴莫斯科，就原子弹和导弹研制问题请求苏联给予援助进行谈判。谈判进展相当顺利，苏方基本满足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全部要求，并于1957年10月15日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该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以及试验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17]。

但苏联对援助中国核武器政策的转变及这一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着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转变，也不意味着苏联已经赞同中国发展核武器。关于苏联领导人做出这一决议的考虑，由于中苏双方解密档案的限制，至今仍然无从得知。但从上述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经济和科技环境、苏联和平共处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以及与美国和英国进行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谈判政策均没有发生变化。但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做出与之前相反的决策呢？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众多推测，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是，苏联以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为筹码，换取毛泽东参加莫斯科会议和对苏联政治上的支持。固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有更深的战略上的考虑。苏联领导人明白，在

③ 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F2510409-0106L: 1-23.

中国缺乏研制原子弹所需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且国家领导人又决心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下，一方面，苏联的援助无疑将加强中国在军事上对苏联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苏联可以通过援助的形式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进行控制，并获取中国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此外，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已转入社会主义体制，即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能够研制出核武器，也不能形成较强的核力量，不会从根本上损害苏联本国的利益，反而还会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

由此可见，苏联在发展国防新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的援助，是以中国在军事上依赖苏联、政治上支持苏联，并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为基础的。但这一基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使苏联领导人感到，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1958年初，考虑到中国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苏联领导人意识到根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模型的做法是不妥的。而当时在对华研制原子弹进行援助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就存在分歧，米高扬公开反对提供原子弹模型，布尔加宁却支持提供。赫鲁晓夫1958年3月把布尔加宁挤出政治局后，逐渐倾向于支持米高扬的立场，提议苏联原先的决定推迟执行。

这样，在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署后仅仅5个多月，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进行援助的想法又发生了转变。在此期间，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帮助和援助也是有限度的，且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延缓中国原子弹研制的进程。

因此，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援助并没有从根本上执行。在1958年7月底到8月初，赫鲁晓夫对北

京进行的秘密访问，当毛泽东提出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提供帮助时，便再次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其理由是：“如果我们给中国人提供原子弹的话，那么，美国人就会把自己的原子弹给西德人。我们拥有原子弹，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可以保护你们。如果发生什么情况的话，我们会代替你们还击的^[19]。要知道制造原子弹，你们是否了解，那是一件需要花钱极多的事。除此之外，它简直要用去你们全国所生产出的全部电力^[20]。”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这次访问不仅没有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且“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表明，苏联希望中国在军事上依赖苏联的战略考虑也落空了。此外，1958年的台海危机也进一步促使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并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21]。1959年初，苏联政府向在华工作的苏联核武器专家发出非正式的指示，建议他们推迟甚至拖延与中国同行的工作。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就暂时停止核援助问题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鉴于正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减军备谈判，苏联必须停止核援助。中方曾要求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数据，但苏方担心这样做会危及社会主义国家在日内瓦的努力^④。最终，1959年8月20日，苏联正式取消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计划，拆除了一枚已经完全组装好的核弹（曾准备交付给中国）。对此，苏共中央的解释是：这可能会破坏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努力。“如果这一武器转让发生，西方得知此事，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就有可能受到损害”^[22]。1959年9月，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出于对中国经济的考虑，并考虑到国际禁止核试验谈判，他决定从中国撤回帮助生产原子武器的苏联专家。1960年7月，在中国核工业不同部门工作的233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109-02563-01: 1-3.

名苏联专家也离开了中国，并带走了所有重要文件和材料^[9]。

关于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作用应给予客观的评价。①**出售设备，初始培训**。苏联通过出售设备、提供初始设计和培训人员，向中国提供了核技术的基础知识，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援助的效果和作用则是有限的**。虽然苏联转让的技术涵盖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但缺乏基本的细节和设备，因此无法形成功能完整的产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限制，最终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问题都是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独立解决的^[3]。③**对中国研制原子弹决策带来重大影响**。苏联援助的突然终止，还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使中国原子弹的发展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对于中国原子弹发展面临的问题，部分苏联专家在撤退时表示，“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23]。赫鲁晓夫也认为，当然，中国人自己会研制出他们的原子弹来，但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对此赫鲁晓夫希望“情况要是没有变化，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24]。

因此，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援助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样的援助形式是脆弱的。在苏联对中国进行援助的基础丧失之后，这种关系的破裂也是必然的，而在此期间，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最终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

3 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批评和阻挠（1960—1964年）

苏联取消对中国进行核武器援助的一个重要的理

由是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裁减军备谈判，此后苏联在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和活动事实上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到阻碍作用。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便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支持苏联的裁军倡议，特别是暂停核试验。在得知中国很快就要制造出原子弹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在1963年8月5日与美国、英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大气层和 underwater 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在这一条约正式签署之前，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就出现了原则性分歧，并就此问题展开了公开论战。中国方面尤其反对并把这个条约视为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背叛。而苏联政府则认为，不扩散核武器符合世界的利益，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如果认为有可能在西方奉行一种政策，而在东方奉行另一种政策，一手反对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反对核武器在世界上扩散，而另一手却把这些武器转移到中国，那至少是天真的……^⑤尽管中国拒绝接受条约的束缚，但这一条约的签署使中国即将进行的核试验面临非常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从客观上对中国核试验的进行产生了阻挠作用。

为了阻挠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进行核试验，在中苏论战期间，苏联还对中国进行了批评。①**批评中国领导人关于原子弹的言论和对原子弹的认识**。在对外宣传方面，苏联领导人喜欢把毛泽东及其战友想象为“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子弹狂热主义者”^⑥，批评中国领导人“原子弹是纸老虎”“一点也不可怕”这种“低估热核战争危险”的言论。批评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认识还停留在“以长矛和刀为武器”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消灭中国所能派出的全部军队”。……“我们了解这个武器，我们的确也拥有这一武器。而毛泽东还在计算——他能派出

⑤ 参见《真理报》，1963年3月14日；4月3日；7月4日和14日；8月4日和21日；9月21—22日。

⑥ АВП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2, л.60-72.

多少军队，派出多少人”^⑦。②批评中国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制造原子弹，是一种民族主义。苏联领导人认为，如果想要拥有原子弹的话，每个国家都能制造原子弹，但是现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拥有原子弹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为造原子弹的花费很大。要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为基础。中国能够制造出原子弹，但应该考虑到工业发展水平。因为，制造原子弹需要国民经济中的许多辅助领域达到一定的水平，来保障按照科学家和设计师的要求来制造原子弹和火箭。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还不具备大量生产核武器的条件。如果中国能够生产2—3枚核弹，这仍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消耗，从而批评中国领导人“不惜任何代价得到自己的原子弹”，并将其视为中国领导民族主义真实的表现^⑧。③贬低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价值和意义。苏联领导人认为，即使中国造出原子弹，也不会被视为核大国，也无法对世界形势带来任何的变化。因为，对于真正发展核武器来说，中国的经济太弱了，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制造足够数量的核武器，才能变得具有威胁。但是，就算这样，中国也无法赶上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也不会原地踏步^⑨。

虽然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这些批评具有论战的成分，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认识和看法。

4 苏联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反应

尽管早在1959年苏联政府就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制造有关的任何援助，但苏联领导人对于中国原子

弹的研制进程和可能进行的核试验有着明确的认识。1963年8月苏联已从外国使节中得知中国很快就要制造出原子弹^⑩。1964年1月13日，赫鲁晓夫在关于中苏关系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制造原子弹的工作了”。1964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在与藤山爱一郎带领的日本代表团进行的会谈中表示，中国是能制造出原子弹的，而且中国应该是已经制造出来了^⑪。

1963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并很快宣布了这一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中国进行核试验，苏联外交部门也进行了密切关注，特别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就国际舆论对中国核试验后的反应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向苏共中央做了报告。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看来，中国成功进行核爆炸仅仅得到了7个国家领导人的正式祝贺。亚非拉国家大多数有声望的政治领导人，更不要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了，他们要么拒不对中国的核爆炸进行积极的评价，要么发表声明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一举动进行了谴责。通过以上分析，苏联驻华大使馆认为，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后，中国领导人随后提出关于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关于完全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是企图从苏联手中夺取世界和平核裁军问题的领导权^⑫。

如果说，苏联驻华大使馆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仍然充满中苏论战的语调，那么，苏联媒体的反应则是非常平静的。虽然苏共中央各报都报道了简单消息，但并未像往常一样对此进行批评和攻击。与此同时，从1963年10月19日起，苏共中央各报已完全停止反华宣传，这一切都与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⑦ РГАНИ, ф.52, оп.1, д.564, л.83-97.

⑧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65, л.12-19; ф.52, оп.1, д.599, л.38-53.

⑨ РГАНИ, ф.52, оп.1, д.564, л.83-97.

⑩ АВПРФ, ф.0100, оп.56, папка495, д.7, с.215.

⑪ РГАНИ, ф.52, оп.1, д.599, л.38-53; д.597, л.115-151.

⑫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26.

有关^⑬。1963年10月16日,就在中国核试验的当天,苏联领导层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职务。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为了改善苏联的国际处境,希望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面对中国国防和军事力量落后而想要从苏联得到军事技术的愿望,又产生了希望中国在军事上依赖于苏联的想法^⑭。因此,1963年12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致函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并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⑮。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正如印度外交部所说,中国爆炸第一枚核弹将改变亚洲和世界的政治平衡。但苏联方面在对外活动中却故意贬低中国原子弹爆炸的作用和意义。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与美国助理国务卿举行的会谈中指出,尽管中国成功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中共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为核强国^⑯。即便是1965年5月中国在成功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实验之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在与夏斯特里举行的会谈中仍然指出,中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是个小玩具^[26]。这实际上反映了苏联对中国拥有原子弹的担忧。正如周恩来所说,“现在苏联对我们也是故意低估,实际上它也怕”。正是中国拥有原子弹以及核力量的不断完善,中国才不怕核打击;而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在对中国进行核威慑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更多的保障。

5 结语

中苏关系友好时期,面对中国提出的对原子弹研制提供援助的请求,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从而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打下了

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对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援助请求,苏联领导人的反应一直都是消极的。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苏联方面曾做出过一些承诺,甚至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但从未对中国原子弹的发展予以真正的支持,并在援助过程中进行种种限制,甚至是多次阻挠。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研制原子弹的决策,还是实际开展工作,都是中国在举国体制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结果,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有效地维护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 1 Timerbaev R M. Russia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1945—1968. Moscow: Science, 1999.
- 2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Т. VIII.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17.
Tikhvinsky S L.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XI Century, Vol. VIII. Moscow: Science, 2017. (in Russian)
- 3 Liu Y Q, Liu J F. Analysis of Soviet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uclear weapons. Compara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ociety, 2009, 7: 66-110.
- 4 沈志华. 援助与限制: 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 历史研究, 2004, (3): 110-131.
Shen Z H. Aid and Restrictions: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s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in the 1950s. Historical Research, 2004, (3): 110-131. (in Chinese)
- 5 聂荣臻. 聂荣臻军事文选.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Nie R Z. Selected Military Writings of Nie Rongzhen. Beijing: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1992. (in Chinese)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ademy of Military

⑬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109-02708-01: 94-97.

⑭ ГАРФ, ф.10026, оп.4, д.2870, л.83-114.

⑮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113-00468-11.

⑯ Hershberg J G, Selected Declassified U. S. and Russi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a.

- Scien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ao Zedong's Military Manuscrip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ddle Volume).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in Chinese)
- 7 牛军. 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5): 37-50.
Niu J. Chinese decision-making in three military 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4, (5): 37-50. (in Chinese)
 - 8 葛能全. 钱三强年谱.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 821.
Ge N Q. Qian Sanqiang's Chronology. Jinan: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2002: 821. (in Chinese)
 - 9 Gobarev Vi M.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07, 12(4): 1-53.
 - 10 师哲, 李海文.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164.
Shi Z, Li H W. By the Side of Historical Giants: Memoirs of Shi Zhe.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1: 164. (in Chinese)
 - 11 王焰. 彭德怀年谱.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Wang Y. Peng Dehuai's Chronolog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in Chinese)
 - 12 刘易斯, 薛理泰. 大漠深处: 中国原子弹秘闻录. 王德禄, 刘戟锋译.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243.
Lewis J W, Xue L T. China Builds the Bomb. Translated by Wang D L, Liu J F. Beij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Press, 1990: 243. (in Chinese)
 - 13 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4): 147-168.
Naumov V P.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ret report of N. S. Khrushchev at the XX Congress of the CPSU. New and Modern History, 1996, (4): 147-168. (in Russian)
 - 14 梁东元. 596秘史.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339.
Liang D Y. The Secret History of "596".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2007: 339. (in Chinese)
 - 15 沈志华.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 历史研究, 2007, (6): 82-109.
Shen Z H. Mao Zedong, Khrushchev, and the 1957 Moscow Mee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2007, (6): 82-109. (in Chinese)
 - 16 东方鹤. 张爱萍传(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612.
Dongfang H. The Biography of Zhang Aiping (Volume 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612. (in Chinese)
 - 17 周均伦. 聂荣臻年谱.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Zhou J L. Nie Rongzhen's Chronolog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in Chinese)
 - 18 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1): 105.
Zubok V M. Khrushchev's Negotiations with Mao Zedong on July 31-August 3, 1958 and October 2, 1959. New and Modern History, 2001, (1): 105. (in Russian)
 - 19 Шепилов Д. 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 Т. Шепило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7): 28-29.
Shepilov D T. Memoirs of D. T. Shepilov. Questions of History, 1998, (7): 28-29. (in Russian)
 - 20 Федоренко Н. Визит Н. Хрущева в Пекин.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0, (1): 121-128.
Fedorenko N. Khrushchev's Visit to Beijing.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1990, (1): 121-128. (in Russian)
 - 21 费正清, 麦克法夸尔.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5—1965).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Fairbank J K, MacFarquha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45—1965).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in Chinese)
 - 22 Aleksandr F, Timothy N. Khrushchev's Cold War. New York: Norton, 2006.
 - 23 宋任穷. 宋任穷回忆录.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4: 590.
Song R Q. Memoirs of Song Renqiong. Bei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1994: 590. (in Chinese)
 - 24 谢尔盖·赫鲁晓夫. 导弹与危机.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785.
Сергей Никитич Хрущёв. Missiles and Crisi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6: 785. (in Chinese)
 - 25 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反对使用核武器文献选载(1955年1月—1965年5月). 党的文献, 1994, (3): 13.
Selected Docu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Energy and Opposition to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January 1955—May 1965). Party Literature, 1994, (3): 13. (in Chinese)

The Soviet Union's understanding and reac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force (1949–1964)

CUI Haizhi^{1*} WANG Fang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Academy of History and Documentation of Social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acing China's repeated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Deterrence Force (SD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refused on the grounds that China'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ere insufficient, that it lack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and that the USSR could provide China with nuclear protection. In the mid-1950s, with the China's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D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USSR opened the door to China in the field of the peaceful use of atomic energy and expanded its nuclear assistance to China to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SDF in 1957. However, the Soviet Union'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SDF did not change. As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eveloped, the USSR leaders not only began to impose various restrictions on the assis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DF, but also repeatedly reneged on the agreement and refused to provide China with the techn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DF and to transfer the model of the bomb. In the early 1960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one hand, criticized China's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DF, and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obstruct China's development of SDF. After the successful test explosion of China's first SDF, the Soviet Union reacted cautiously to China's nuclear test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because of its awareness of China's nuclear capability.

Keywords China, Soviet Union, strategic deterrence force, development, reaction

崔海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苏联史、冷战史、国际共运史。
E-mail: cuihaizhi@126.com

CUI Haizhi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Department of History, Academy of History and Documentation of Social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is main fields of research are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E-mail: cuihaizhi@126.com

王 芳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主要从事苏俄航天史、科技史研究。E-mail: wangfang@ihns.ac.cn

WANG 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Soviet Union's and Russia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history of aerospace.
E-mail: wangfang@ihns.ac.cn

■责任编辑：文彦杰

*Corresponding author